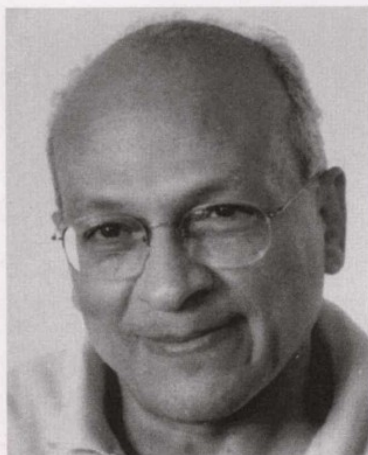


宰阿法拉尼区奇案

〔埃〕哲迈勒·黑托尼著 宗笑飞译

**当代埃及最富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作家
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获得者**

局面是荒诞的，然而思想却是严肃的，反映的现实也是严肃的。《奇案》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看似荒诞、却又现实的世界。能够思考，是一个民族还有理想、还有希望的标志。但如果不能够采取适当的手段，那这理想会不会成为一个永远不着边际的梦幻？希望会不会日后衍变成极端的失望？



Gamal Ghitany



世界文学论坛·新名著主义丛书

宰阿法拉尼区奇案

〔埃〕哲迈勒·黑托尼著 宗笑飞译

南海出版公司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5-03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宰阿法拉尼区奇案/(埃及)黑托尼著;宗笑飞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7.5

(世界文学论坛·新名著主义丛书)

书名原文:The Event in Zaghfarani District

ISBN 978-7-5442-2709-4

I. 宰... II. ①黑... ②宗... III. 长篇小说—埃及—现代 IV. I4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7022 号

Copyright © 1975 by Jamal Al-Ghitani

All rights reserved

ZAI A FALANI QU QI AN

宰阿法拉尼区奇案

丛 书 名: 世界文学论坛·新名著主义丛书

作 者: [埃]哲迈勒·黑托尼

译 者: 宗笑飞

策 划: 万语文化

责任编辑: 杨 雯

特约编辑: 邱 红

装帧设计: 姚 荣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85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2709-4

定 价: 24.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世界文学论坛·新名著主义丛书》编委会

总策划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上海万语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总监修 大江健三郎

主 编 黄宝生

副主编 陈众议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刘象愚 朱书民 许金龙 庄 焰 吴正仪

陈众议 杨 雯 金 浩 宗笑飞 侯玮红

钟志清 徐维东 黄宝生 黄 梅 萧 萍

● 多元文化的并存与交流

——为未竟的“世界文学论坛”而作（代总序）

陈众议

◎缘起

这套丛书是未竟的“世界文学论坛”的一个分号。它缘起于大江健三郎先生的一次学术访问。那是2000年9月，大江先生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邀请来到北京。这是1949年以来应邀来华访问的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用作家徐坤的话说，“他的意义将在不远的将来得到彰显”。这显然是参照二十世纪初泰戈尔访华所留下的无形遗产而言的。大江先生在北京见到了心仪已久的莫言，并与王蒙、铁凝、余华、阎连科、徐坤等中国同行及社科院的学者和领导进行了亲切交谈并有感而发，提出了在中国举办“世界文学论坛”的动议。

这套丛书便是这一动议的见证。

◎意义

人类以并不乐观的状态进入二十一世纪。经济、政治利益引发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碰撞乃至冲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激烈。然而，相信正义、博爱与和平的人们也在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热忱进行着消解冲突的努力。本丛书是这种努力的一个明证。

丛书为世界著名作家和中国读者搭建了一个平等对话、友好交流的平台。他们的著述将作为国际文化交流的一个里程碑而载入史册。

众所周知，文化不同于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它是大到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小到一个地区、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某种共同的习性；这种习性，可以抽象为世界观，也可以具体为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特殊嗜好。总之，它是以有别于他人为前提的一部分人的共性。正因为这种特殊性，而且又是后天的，所以才有了不同文化间交流互补的必要和可能。实际上，不同规模的文化交流一直存在。交流是为了相互了解、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和平共处，而非倾轧或取代。

事实上，世界文化正是在相互了解、求同存异中不断演化、进步并形成今天这种大自然般赤橙黄绿青蓝紫杂然纷呈的多彩局面的。无论情愿与否，这种局面已经形成。我们希望它的未来没有血腥，而是不同文化友好交流、健康演化、取长补短、自我完善的过程。

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又注定要接受全球化浪潮的挑战。如何保护和发展人类文化生态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全世界面临的重大课题。世界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耀眼明珠，是世界各国社会经济政治形态的形象反映，是各民族历史与现实、情感与意志的集中体现。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社会时指出，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而恩格斯则认为，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人不可能事事躬亲、处处躬亲，但却可以通过文学感同身受地体察别人的生活、了解别人的世界。正因为如此，文学历来并将永远成为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增进理解的桥梁。

作为编译者，我们将努力使丛书成为文学的盛宴、和平的盛宴。盛宴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在近二十年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上都是空前的，它将使我国读者感同身受地了解一批世界著名作家、文化名人及其斑斓的世界和关怀，而且对促进我国的文化建设也将不无裨益。

◎基数：为了拿来的甄别

话说有个印第安人居住在深山老林。一天，他有幸来到遥远的海边，看到集市上到处都在买卖舢板。于是，他也掏钱买了一条。他历尽千辛万苦把舢板带回家中，并学着海边人家的样儿把它供在房屋顶上；只不过别人屋顶上的舢板都是底儿朝天的，而他的舢板却仰面躺着。不久，天降大雨，盛满雨水的舢板压塌了房屋……这是一则古老的寓言，意思是别人的宝贝对自己未必有用，稍有不慎，非徒无益，而又害之。面对多元的花花世界，我们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呢？

难说我们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然而，编译眼前这样一套体现多元文化的丛书有助于我们处理认知和估价、传承与创新、借鉴与自主、向背与审美的复杂关系。马克思关于席勒化的说法众所周知。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否定席勒的依据。马克思除了尊称席勒为“市民天性”的权威裁判，还援引席勒名言，谓“智者看不见的东西/却瞒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事实上，认识观和价值观是不可以划等号的；同样，进步和审美或者革命和美感，也是不可以划等号的。以马克思为例，他并没有因为他的价值观而影响他用历史唯物主义去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之，也不因为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认知而动摇自己的价值判断。比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深恶痛绝，而且为推翻资本主义这种剥削制度尽心竭力，但是他并不否定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和发展趋势。他说：“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这不正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济全球化”吗？然而，马克思并不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历史趋势而放弃共产主义运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则进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

辩证法的正确：意识对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与此同时，文学观念和形式的演变也为我们提供了复杂的课题。以二十世纪而论，一方面，文学在形形色色的观念（有时甚至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或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的驱使下愈来愈理论、愈来愈抽象、愈来愈“哲学”。卡夫卡、贝克特、博尔赫斯也许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而存在主义、现实主义和“高大全主义”则无疑也是观念的产物、主题先行的产物，它们可以说是随着观念和先行的主题走向了极端，即自觉地使文学与其他上层建筑联姻（至少消解了哲学和文学、政治和文学的界限）。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十世纪批评的繁荣和各种“后”宏大理论的自话自说顺应了这种潮流。另一方面，技巧被提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到科塔萨尔的《跳房子》，西方小说基本上把可能的技巧玩了个遍。俄国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法国叙事学和铺天盖地的符号学与其说是应运而生的，毋宁说是推波助澜的（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小说的形式主义倾向）。于是，热衷于观念的几乎把小说变成了玄学。借袁可嘉先生的话说，那便是（现代派）片面的深刻性和深刻的片面性。玩弄技巧的则拼命地炫技，几乎把小说变成了江湖艺人的把势。于是，人们对情节讳莫如深，仿佛小说的关键只不过是观念和形式的“新”、“奇”、“怪”。然而，古人不是这样的。中国小说的起源是轻松自如的故事情节（或谓“稗官野史”），而事实上《左传》及《左传》以降的诸多史书也是中国小说的策源地（是谓“文史一家”）。其中如《郑伯克段于鄆》、《曹刿论战》、《触龙说赵太后》、《蔺相如完璧归赵》以及《伯夷列传》、《管晏列传》、《屈原列传》等众多美妙的段子，其实都可以视作最初的小说，具有小说的基本因子：故事情节。诚然，由于道统对小说的轻忽，中国小说及小说史研究起步甚晚。一如鲁迅所言，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且必得到二十世纪），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在西方，虽然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及小说史研究也是后来的事，但古希腊人对“类小说”的重视早在亚里士多德时期便已然露出端倪。比如亚里士多德对文学（史诗、悲剧）的态度，其实已经体现了古希腊人对小说（情节）的重视。亚里士多德视

情节为文学的首要问题，认为它是一切悲剧的根本和“灵魂”。他还说“情节是悲剧的目的，而目的是一切事物中最重要的”。因此，《诗学》中差不多三分之一章节是有关情节的。在悲剧的六大要素中，情节列第一位，依次是性格、语言、思想、场景和唱词。当然，情节和故事原是不同的，情节或可说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故事，但绝对不是脱离故事的观念和技巧。过去的文学原理大都拿国王和王后的例子来说明故事和情节的关系，称“国王死了，两年后王后也死了”是故事，而“国王死了，深爱着他的王后便无法独自存活在这个世上，于是郁郁寡欢，最终成疾而终”则是情节。这就是说，情节是有血有肉的故事。当然，这是一种简单化诠释。倘使以《红楼梦》为例，两者的关系就比较明确了。因为，我们或可视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为故事，而家族没落与爱情悲剧则是其情节。诸人物的性格、形象、命运等等，在情节中逐渐演化并凸现出来。或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故事是两个世仇家族子女的爱情悲剧，而情节几乎可以说是整部作品。这样，在浪漫主义之前，情节对于文学，尤其对于戏剧、小说甚至史诗一直是精华要素，因而地位十分稳固。相形之下，主题却是后来才逐渐显露和凸现出来的。在人文主义的现实主义及其之前的文学中，主题是自然显露甚至深藏不露的。荷马史诗是行吟诗人的作品，其主体意识和主题思想是那样的淡然，以至于后人不得不在归属问题上煞费脑筋。而作品中的各色人等，无论是阿伽门农、奥德修斯、阿基琉斯还是帕里斯，个个都是英雄。是非、善恶等价值取向尚不在诗人（或行吟诗人们）考虑的要素之中。古希腊悲剧也是如此。我们的先人却不然。他们处理文史的方式似乎比较老到。司马迁之所以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原因，固然在其修史记事的抱负，但《艺文类聚》中《悲士不遇赋》所表现的悲愤和褒贬印证了他对历史及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倒确是“早熟的民族”。如今，当主题愈来愈成为诗人、作家首先考虑或急于张扬的要素时，亚里士多德的情节崇尚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首先，浪漫主义文学是比较典型的观念文学。浪漫主义把情节降格为小说内容的某个轮廓，认为这种轮廓可以离开任何具体作品而存在，而且可以重复使用、互相转换，可以因具体作者通过对人物、对话或其他因素的发展而获得生命。这基本上把情节降格到了某些故事套路甚至于

俗套的地步。即便如此，浪漫主义小说仍然没有抛弃情节。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惯性使然，另一方面则是浪漫主义表现意志、宣扬观念的需要。马克思在评论席勒时，就曾称其作品为时代的“传声筒”。相对于“席勒式”，马克思自然更推崇情节的生动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完美融合的“莎士比亚化”。马克思的观点来自于他的立场和方法。他从不孤立地看问题。他关于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思考是对人类社会，也是对肉体与灵魂这对冤家矛盾的昭示。灵与肉、“道”与“器”，人类缺其一便不成其为人类。曲为比附，文学中的主题和情节也有点像人类的灵魂与肉体，二者不可或缺。然而，浪漫主义对情节的疏虞与现代主义对情节的轻视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经过现代主义（或者还有后现代主义）的扫荡，情节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以至于二十世纪的诸多文学词典和百科全书都有意无意地排斥情节、轻视情节，把情节当做可有可无的文学“盲肠”。于是，观念主义和形式主义在小说创作中大行其道。于是，二十世纪的许多小说仿佛专为评论家而写，成了脱离广大读者的迷宫与璇玑。虽然从文学创新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看，观念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存在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可以说是一种必然。在西方，最早关注和凸现主体意识和主题思想的是人文主义的现实主义，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但最初的人文主义作家并没有因为强调主题而忽视情节。恰恰相反，无论是在莎士比亚还是在塞万提斯那里，情节依然是文学的关键。正因为如此，也因为受众的欢迎，他们一度受到经院作家的轻视，被冠以“通俗”。马克思从活生生的存在出发，但又不拘泥于存在本身。他像一位双脚踏入河床的巨人，在感受河水鲜活翻腾的同时，俯瞰人类文明之流从远古奔向未来。而他所选择的莎士比亚恰好是我假定的这个X（两条曲线）的交汇点。在这里，情节和主题是那么和谐、那么水乳交融。新鲜的人文思想和来自欧洲大陆，尤其是文艺复兴运动方兴未艾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和北欧的故事，天衣无缝地生成为美妙的情节。但这种和谐的、水乳交融的状态迅速被日益高亢的个人主义所扬弃。先是浪漫主义，后有批判现实主义。巴尔扎克等一代作家对资本主义（血淋淋的现实）的批判如此富有力度，以至于模糊了创作主体（如保皇派和革命派）的界线（恩格斯称之为“现实主义的胜利”）。在高扬的批判意识和价值取向（或谓主题思想）背

后，则是巴尔扎克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现代建筑师般的精确图景。用昆德拉的话说，这些精确的图景、过细的谋划使原本相对自由的小说创作形式改变了方向。再后来是以“科学主义”自诩的自然主义或把主题（包括人的几乎一切内涵和外延）和形式（包括技的一切可能与界限）推向极致的现代主义以及反过来否定（颠覆）和怀疑（解构）一切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这些赤裸裸的观念主义和形式主义其实也是创作主体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的鲜明表征，是当今世界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极端表现。倘使不是世界进入了跨国公司时代，新自由主义便无法生成；同样，倘使不是世界进入了跨国公司时代，西方的政治家也断然没有能力发明“人权高于主权”之类的时鲜谬论。盖因跨国公司不会满足于一国或几国的资源。它们当然要消解各国主权，以致其剥夺在全世界畅通无阻。总之，比起我们过去总结的现代主义成因种种（如科技进步对形式变化或技巧翻新、世界大战对文学宣言或先锋思潮，等等），跨国公司所推崇的极端个人主义不是更具有说服力吗？无论接受美学如何重视读者（其实这里的读者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个人），无论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方面毫无时代意义（借镜作用）的真正意义上的通俗文学（以金庸、琼瑶作品为代表）如何受到欢迎，无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审美、认知、现实意义的所谓“通俗文学”（如形形色色的现实主义文学）怎样顽强地存活于我们这个世界，似乎都不能改变情节+主题——两条曲线所组成的这一个 X。

然而，一如马克思，我们不该因为文学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脚步呈现出这样那样的规律而放弃人文应有的作用与反作用。何况文学终究是复杂的，它是复杂社会中人类复杂本性的最佳表征，也是我们这套丛书的主要缘由：为了拿来的甄别、为了借鉴的认知，即给读者一个基数，一个几经筛选的基数，一个尽量多元、多维的空间，既有西方和东方，也有新交和故人（如笔耕正健的大江先生和刚刚仙逝的桑塔格）；既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赓续，也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复归。

总之，我们以最简捷、也最深刻的方法请来了这十余位作家。希望读者在这一文学的盛宴中得到最大的欢愉和启迪。

● 译序：寓思考于荒诞

埃及当代著名作家哲迈勒·黑托尼，于1945年5月9日出生于上埃及的一个农村。上埃及留有大量的法老文化遗产，这使他自幼就与法老文化结下不解之缘。幼年时，他随父亲举家迁往开罗，生活在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埃及著名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出生、成长的老城区——哲迈利耶区。尽管家境贫寒，但是父亲仍然努力供他读书，而哲迈勒·黑托尼也表现出了坚韧的好学精神。除了上课之外，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还在很小的时候，就经常攒下一些零用钱，到书摊上涉猎各种文学书籍，对外国文学也有了浅显而初步的了解。渐渐长大之后，他还经常去图书馆，吸取各种文学养分。同时，他还坚持参加每周由纳吉布·马哈福兹主办的文学讲座。这些都为他日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哲迈利耶区是开罗的老城区，有着浓厚的伊斯兰文化色彩，生活这样的环境中，哲迈勒·黑托尼对伊斯兰文化产生了浓厚的感情。在学校时，他的主要专业是工艺美术设计，毕业后，又从事过一段时间的地毯设计工作。这一方面加深了他对民族艺术的了解，另一方面还使他对社会底层的民间疾苦有了深刻的体会，了解到他们的生活面貌，思想状况，从而发现了许多真实而严峻的社会问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黑托尼曾经做过六年的战地记者。对战争的亲身经历，对战争失败的冷静认识，都使他对人生、对生命有了一种全新角度的深刻思考。这段时间的经历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在他的很多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对社会黑暗面的披露，对战争、对人类思想的发展方向、对生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人类应该如何面对生活、超越死亡，都有着深刻的思考，他常用大量的篇幅，借书中的人

物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黑托尼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很深，是埃及的“左”派代表作家之一。1966年，他还因“共产党罪”而入狱半年，在狱中，他与埃及著名的共产主义人士艾敏·阿莱姆有过密切接触，艾敏的一些观点和思想对黑托尼影响巨大。黑托尼曾经认为，伊斯兰教与共产主义是不矛盾的，埃及浓厚的伊斯兰宗教文化给黑托尼的共产主义思想打上了特殊的烙印。在很多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对共产主义的独特理解，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宗教色彩。

黑托尼的文学创作尝试，开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初，他经常在杂志上发表一些文学短篇。其处女作是短篇集《千年前青年日记》（1969），其中《千年前青年日记》通过虚构一个千年前的青年对当时在埃及爆发的战争的记录，影射了当时埃及所处的现状与潜在的危机，反映出黑托尼对巴以战争以及共产主义思潮在埃及的发展的反省与思考。这篇小说的出版，反响不凡。评论界赞誉黑托尼初登文坛，就颇有埃及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优素福·伊德里斯崭露头角时的气势。

此后，黑托尼不断有作品问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影响较大的有长篇小说《吉尼·贝拉卡特》（1974）、《宰阿法拉尼区奇案》（1975）。《吉尼·贝拉卡特》这部小说摘录意大利旅行家琼迪16世纪访问开罗的见闻作为开头和结尾。讲述了1517年马木鲁克王朝时期一个小人物充满了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发迹史。一方面给我们描绘出了阴险狡诈、钻营牟利的强权者脸孔，另一方面又让我们看到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如履薄冰的生活画面。小说以16世纪的社会为背景，但却真实地反映出20世纪70年代埃及社会的种种面貌。也正是因为这样，作者有了更大的叙述空间，在埃及政治空气比较紧张的年代，该书的出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此后，该书还被译成法文。《宰阿法拉尼区奇案》讲述的是发生在开罗一个老城区的荒诞故事，通过对故事的夸张描写，反映出细致而真实的人类心理状态，可谓是一部寓庄于谐、寓荒诞于思考的小说。

黑托尼的作品特点鲜明，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他非常善于借鉴本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其许多作品，都是借描述前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

来体现他对当今社会的现实及思想领域问题的思考。法老时期的文化遗产与伊斯兰文化、文学遗产，特别是苏非文化，对黑托尼的创作影响较大。同时，在创作手法上，黑托尼则引进西方各种创作方法，结合本土文学特点进行尝试和创新。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总是试图将小说放在整个阿拉伯文化遗产的氛围之中，同时创造一些新的表达方式与手法。”他的许多小说，如《宰阿法拉尼区奇案》、《显灵书》等都类似于心理小说。小说的情节性不是很强，却用大量的篇幅来描述人物的思想、心理状态，从而反映出人物或迷失、或混乱、或惶恐的心态特征。在这一点上，《显灵书》体现得尤为明显。黑托尼的其他作品还有《都市之广》（1990），《落日的呼唤》（1992），以及近年来的新作《金字塔之上》（2002），《企业传闻》（2003），《矿藏传闻》（2003）以及《三面包围》（2003）等。

正是由于黑托尼的大胆尝试，他的作品才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他也迅速成为埃及新一代作家的代表。他的多部作品曾被译成德文、俄文、法文等，深受国外读者的喜爱。黑托尼先后获得了1980年的国家鼓励奖、埃及科学艺术一级勋章和1987年法国骑士勋章，成为整个阿拉伯文学文坛都颇有影响的名家。从1993年至今，黑托尼一直担任埃及《文学消息》报的主编。

《宰阿法拉尼区奇案》以最高安全委员会的一份记录档案的形式，向我们讲述了一个荒诞的故事。一位著名的苏非长老制造了一个咒符。所有宰阿法拉尼的人，除了一男一女以外，在一段时间内都会丧失性功能。他预言说，咒符的影响将会扩大到整个世界，而且这只是他改善世界状况的第一步。他的目的是要通过给人类打击，让他们来反省自身状况，认识生命的本质。同时，他还呼吁，人类应当共同努力，来创造一个没有战争、没有饥饿与压迫，人与人之间能够完全平等的公正的社会。他认为，这样的目标靠正常的手段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因此他为人们制造了咒符，要创造一个咒符的世界。此外，他还为街区的人制定了几项新规定：居民不得吵架，要友爱宽容；要在晚上八点的时候准时睡觉，早上七点之前不许出门，并且大家要在

同一时间吃同样的早饭。围绕着咒符给街区带来的变化，街区人们陷入烦躁之中。一方面，由于恐惧心理、侥幸心理，人们对长老的规定都严格服从。但另一方面，人们又似乎特别没有耐性，常常会产生怀疑和绝望的心理，每个人都处在紧张的状态下，总觉得自己心里想的，也会被别人知道似的。在希望和绝望的交织、缠绕之下，大家做出了各种各样的举动。暴露出了人性最受压抑、最原始的一面。

整部《宰阿法拉尼区奇案》，是以记录档案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小说的情节时间特征不明显，主要是突出不同的人在面对同一件事的时候的不同行为和心理活动，从而使这部作品接近心理小说的范畴。这对当时的埃及文学来说还是一种新的探索与尝试。从框架上看，小说是以自然时间的演变为顺序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一开始，反映的是街区很多人都到长老那儿去叙述自己的问题。接着又描写在长老训示之后，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人们生活的变化。但是，在每一章节上，作者又将倒叙、顺序、插序等各种手法糅合起来，或通过档案的记载，或通过每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勾勒出人物的大体生活轨迹。例如，在一开篇，先写阿卜杜赫去找长老反映问题，接着又以记录的形式介绍他的工作经历，让人大致了解了以前的生活。而阿维斯的经历，则是通过他在长老面前的不断讲述、不断回忆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对于拉麦奈的生活介绍，则是二者的结合，有的是记录，有的则是拉麦奈自己的回忆。通过将这些散乱在不同章节里的零零落落的片断串联起来，按自然时间的发生顺序排好之后，每个人的生活就都基本上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同时，这也突出了小说创作手法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虽然还是设置在一个卷宗记录的大框架下，但每一卷里有很多地方已经凸现了人物自身心理回忆的成分。因而，小说一会儿采用的是全知性叙事方式，一会儿采用的是限制性叙事方式。在刻画拉麦奈一个人在屋子里回忆狱中生活、戴徒里在咖啡馆想着自己的大楼时，小说实际上采用的是全知性叙事手段。这时的人物心理特征是通过自身来勾勒的，让我们读起来更像是人物在对我们做心灵自白，由他们来对我们回忆以前，描述现在，设想未来，而不像是我们在看

一份卷宗。特别是在关于哈桑·艾努尔的专门一卷中，由于是原封不动地引用了哈桑的笔记，这种全知性叙述的特点就更明显了。而在叙述事情的进展状况、咒符最后波及到各个地方的人这些事情上，小说限制性叙述的特点就比较明显了。我们这时就明显地感觉到，自己是在读一份客观记录当时事件的卷宗，我们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距离事件较近的另一一些旁观者的记录。小说中发生的事件又在空间上、心理上和我们拉开了距离。实际上，这两种手法，在每一章节内都交叉、糅合在一起，这样就使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感觉事件忽远忽近，人物忽亲切忽淡漠，作者正是通过这样的手法让读者有了一种独特的心理感受。

这种独特还不仅于此。小说在思想内容上也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作者描述了一个荒诞的故事，荒诞陌生到了让我们觉得，看到的似乎本身就是一个不论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离我们很远的奇闻怪事。同时，情节发展的不明显，对一件事情通过不同人、不同时间的反复回忆和思考，使小说乍看上去，似乎有些杂乱无章，这更加增添了小说的荒诞性。但是，通过小说为我们塑造的在荒诞的状态下生活着的各式各样的人物，我们又寻找到一丝熟悉的感觉。小说中没有有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每一个出场的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每一个人都被现实困扰，每一个人身上都暴露着最细微然而又是最普遍的人性的弱点。这样的人在我们身边似乎就能找到很多，他们的心理，似乎有些时候，就是我们心理的体现。长老以最严肃的思考，要建设一个博爱、公正，没有战争、饥饿、贫穷的大同世界，然而却采取了一个让男性丧失性功能，女性也不能和任何人过性生活这样一个荒诞的手段。拉麦奈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曾经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可是却和陶侯尼想着要挖地道，通过掠夺富人财产，将富人变成穷人，然后在一起平分财物这样一个幼稚的手段来实现共产主义。局面是荒诞的，然而思想却是严肃的，反映的现实也是严肃的。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既不现实、却又现实的世界。能够思考，是一个民族还有理想、还有希望的标志。如果不能采取适当的手段，那这理想会不会成为一个永远不着边际的空幻？希望会不会日后衍变成极端的失望？这也正是作者创作该小说时，埃及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和思想状况

的真实反映。大的方面，小说体现的是作者对祖国发展走向的深刻思虑。小的方面，小说体现的则是作者对人类应该如何看待人生、思考人生的反省。每个人不能懵懂地活着，不能被琐碎、太过实际的事情羁绊过多，那样人类就不能在深夜里反省自身，不能够推动人类思想进程的发展，不能亲自观察、参与世界的改变。那样，也就不能善待自己的人生。实现目标，还要有正确而可行的方式方法，否则，结果就像宰阿法拉尼区一样，反而陷入了更大的混乱。走完一生的道路，也就是在这纷杂的舞台上，上演了另一幕闹剧。

在埃及经历了埃以战争的失败，经历了埃及经济的倒退，加上自身战地记者的亲身体验后，黑托尼的许多作品都体现了类似的思考。在情节、内容上，他还总爱突出荒诞性的特征，这一点在他的另一部小说《都市之广》里也有体现，这并非由于作者故意哗众取宠，而是通过选择荒诞的情节，拉远读者与小说的距离，似乎给了人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但是，时不时渗入其中的严肃思考与真实入微的人物心理刻画，又迅速地拉近了读者与小说的距离，将一个个严峻的思想、社会问题直逼到读者的眼前。这样，荒诞与严肃形成了鲜明的视觉反差和心理反差。作者正是要透过这种反差，引起人们的警醒和深思。

2004年2月29日